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翻译研究入门： 理论与应用

Jeremy Munday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三十二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翻译研究入门：
理论与应用**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研究入门:理论与应用/戴炜栋主编.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1738-3

I. 翻… II. 戴… III. 翻译理论—研究—西方国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5177号

图字: 09-2008-670号

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ISBN-13: 978-0-415-22927-2

Copyright©2001 by Routledge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aylor & Francis Books Ltd,
2 & 4 Park Square, Milton Park, Abingdon, OX14 4RN, UK.

Licensed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booksellers found selling this title
outside the Mainland of China will be liable to prosecution.

本书由泰勒·弗朗西斯出版社授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仅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Taylor & Francis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孙 静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彩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7.875 字数 338千字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738-3 / H · 0744

定 价: 22.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出版说明

近年来，国内翻译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有关翻译研究的丛书也出了多套。不过，长期以来，国内引进的原版翻译著作匮乏，不少研究都是根据二手资料；另外，学习翻译专业的研究生人数越来越多，这种状况若继续存在，将十分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培养。鉴于此，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约请了多名国内翻译研究著名学者分别开列出最值得引进的国外翻译研究论著的书目，并对这些书目进行整理、排序，最终确定了准备引进的正式书单。该丛书涉及的论著时间跨度大，既有经典，也有新论；内容的覆盖面也相当广泛，既有翻译本体的研究，也有跨学科的研究。这套丛书的引进将会满足翻译专业研究生教学原版参考书和翻译理论研究的需要。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谨以此丛书献给我国的翻译学界。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 季羡林 王宗炎 刘重德

副主任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申 丹 吕 俊 刘靖之 许 钧 庄智象 李文俊
汪榕培 金圣华 金 隄 林戊荪 罗新璋 罗选民
杨自俭 张 今 张柏然 郭建中 程镇球 谭载喜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克非 王 宁 王宏印 王东风 方梦之 毛荣贵
刘士聪 刘树森 刘和平 刘宓庆 冯庆华 朱纯深
朱志瑜 孙致礼 孙艺风 孙迎春 李亚舒 汪义群
连淑能 范守义 陈宏薇 林克难 罗进德 罗国林
邱懋如 郑体武 杨晓荣 张美芳 张南峰 柯 平
柯文礼 郭著章 高 健 黄 任 黄振定 黄忠廉
崔永禄 傅勇林 辜正坤 谢天振 蔡新乐 廖七一
穆 雷

秘书 孙 玉

借鉴和创造 (代序)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自成立以来一直是我国外语教育最优秀的后勤部和侦探部。因为它不但为我国各个层次（尤其本科与研究生层次）的外语教育提供了多种高水平的教材、教参和工具书，而且还出版了多学科、多语种和多系列的中文版和外文版的学术著作，比如“现代语言学丛书”、“牛津应用语言学丛书”、“美国文学史论译丛”、“外国文学史丛书”、“剑桥文学指南丛书”、“当代英语语言学丛书”以及列入国家及教育部规划的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的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等方面的图书等。为了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教育改革的需要，还出版了一批国际金融、对外贸易、涉外保险、国际经济法、国际新闻和管理科学等方面的教材与专著。这些著作在外语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以及复合型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在发挥着强有力的侦察、调研和指导作用。这是外语界有口皆碑的。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纵深发展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对比语言学和翻译学近些年来在我国有了较快的发展，最突出的证据就是①外语类硕士博士点上研究对比与翻译方向的学生在逐年迅速增多，而且我们的高校已经有了翻译学院和翻译系（当然还太少）。②外语专业的学生考中文、法律等其他人文社科专业的硕士、博士以及反方向的走向已经起步。这种跨学科的人才已成为人才资源竞争的最主要对象，因此发展趋势定会看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适应这种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新学科建设的需要，不但积极出版国内关于对比研究和翻译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最近又推出了原版“国外翻译研究丛书”，这套丛书时间跨度从古代到现代，所选书目皆为译学发展史上有里程碑作用的名家名著，堪称译学经典。他们计划分批出版，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这套丛书的出版首先可以解决国内翻译教学原版参考书多年匮乏的困难，真可以说是我国翻译教学与理论研究的及时雨。我想学习和关心这个学科的师生和其他人士定会对这套书的引进为之欢呼，为之祝贺。

这套丛书的价值还在于能大大促进我国翻译学科建设的发展。译学学科的发展依赖于研究者在三个方面的深入研究和结合。一是对本国译学的继承性研究；二是对外国译学的借鉴性研究；三是对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只有这三者研究深入并结合好了，才可能从经验与技巧逐步升华为具有科学性的译学理论。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已取得了很显著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翻译学在我国已于20世纪80年代末有了独立学科的初级形态，90年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对学科的独立性以及理论体系的结构与功能有了更多的探讨。依照学科建设的规律和研究现状，我们尚需在上述三个方面加大研究力度，而这套丛书就是借鉴性研究的主要资源。从这个角度讲，这套丛书的引进也是我国文化基本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

在新的世纪，文化（包括各类科学技术）会多方面快速深入人类的日常生活，各国之间的交流会空前深广，因此翻译的功能会逐步扩大，实用性翻译人才的需求量定会空前增加。这就要求我们除了做好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以外，还应十分重视实用性人才的培养和应用译学的研究。我想出版社一定会关注和引导译学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发展趋势。

杨自俭

青岛海洋大学六三居室

2001年3月28日

一部面向译学后进的蒙学读本

——《翻译研究入门：理论与应用》导读

一、初评

20世纪50年代以降，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强劲发展，西方译界终于超越了长期被奉为主臬的语文学研究范式，从而迎来了翻译研究的第一次实质性转向。译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不啻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浪潮，于是一大批富于洞见的研究文献相继面世，其中如Jakobson、Catford的语言学翻译观以及Nida关于翻译科学的探讨均对当时及后世译坛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从发展的眼光看，上述转向实不乏里程碑意义：翻译的艺术观渐至让位于翻译的科学观，而方法论上的新旧更替不仅使翻译研究中的微观对象把握变得更为客观且有理可据，同时就宏观层面来看，随后出现的针对“翻译科学”（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及相关概念的考问与反拨也将于短短20余年内把整个译学研究进程推向一个全新的局面，这即是后来Snell-Hornby（1990）所谓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文化转向”无疑开启了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元化翻译研究格局，同时也促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氛围。正如国内有学者所言：20世纪70年代以降，后现代理论已全面介入译学研究：多元系统论、解构主义等刚刚唱罢，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又纷纷登台（王东风 2003）。的确，当代西方译坛新理层出，实在令人目不暇接了。然而另一方面，面对名目繁多的西方译学论著，人们于欣喜之余又不禁感到了某种缺憾：作为一门综合性研究学科，译学领域的诸多复杂问题每每令初涉者望而生畏，鉴于此，在众多深得译学要旨的名家中，似乎该有人为我们撰写一部普及性读物，从而以启蒙的方式引领译学后进顺利步入翻译研究的殿堂。也许正是为了顺应这一呼声，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杰里米·蒙

代 (Jeremy Munday) 于2001年付梓了《翻译研究入门: 理论与应用》(*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这部开启当代西方译学大门的蒙学读本。

蒙代教授现供职于英国萨里大学现代语言学及文化学院, 目前为该校翻译研究中心执牛耳者, 其学术涉猎甚广, 遍及应用与描写译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西班牙及拉丁美洲文学与翻译等诸多领域。除本书外, 业已出版的译学论著尚有《翻译中的文体与意识形态》(*Style and Ideology in Translation*)、《翻译研究指南》(*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高级译学原典读本》(*Translation: 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 (合著) 等, 此外还主编过《作为介入的翻译》(*Translation as Intervention*) 一书。

鉴于其丰富的学术背景,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作者一定能够轻车熟路地为我们洞开一片当代西方译学研究的新天地。事实也正是这样, 在本书中, 面对汗牛充栋的译学论著与浩如烟海的西方译学思想, 作者的确做到了游刃有余, 谓其信手拈来, 并未有言过之处。仅以书名为例, 寥寥数语即已提纲挈领地向我们展示了作者撰写此书的明确意图: 1. 启蒙性——可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入门教材, 也可为教师、研究者及翻译人员等提供理论基础; 2. 理论性——系统地梳理了古罗马以降的翻译理论流派与思潮, 精心绘制了一幅西方译学研究的进程图; 3. 前沿性——对翻译学进行了全方位介绍, 全面展现了本领域最新学术成果及研究动向; 4. 实践性——对不同时期的重要译论进行了理据充分的个案分析, 突出了译学研究的实践性与实证性原则。

观全书布局与架构, 更不乏可圈可点之处。首先, 各章均体系性地安排了7大板块的内容: 1. 重要概念: 对关键性术语及观点进行要言不烦的界定与描述; 2. 关键文本: 以参考文献方式列出与探讨内容相关的代表性文本; 3. 全书正文: 除前两章外, 各章均从历时的角度详尽介绍了每一历史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翻译思想; 4. 个案分析: 针对某一重要理论进行考据和考证, 以检验其实际操作上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5. 章节概要: 对即将介绍的相关内容进行言简意赅的总结; 6. 阅读书目: 提供“关键文本”以外的其他参阅或参考文献 (首章除外); 7. 启发式问题: 各章均安排了数量不菲的问题或论题, 用以激发学习

者进行拓展式思考与研究。其次,在内容安排上,作者亦可谓费尽了心思。除引论部分外,其余各章依次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译学流派与思潮进行了系统性分类、归纳、分析、批评与实证,内容涉及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翻译的文化途径与哲学视角及翻译的跨学科综合方法,其中涵盖了翻译研究中的对等概念、功能取向、意识形态与诗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诸多方面。为便于读者对本书进行全面把握,下面就各章节主要内容作简要概括与评述。

二、内容简介

开篇一章为全书导论部分,内容涉及翻译概念阐释、翻译研究演进史、现代译学发展脉络、各章主要内容梳理等。作为重中之重,本章着力介绍了Holmes/Toury的描写译学范式,原因是Holmes首先开河地将翻译研究划分为纯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大门类,并依照实践性原则为翻译研究进行了严密的定位,其影响于后来者实可谓荦然,如Toury的描写译学建构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研究范式的启发。接下来一章追溯了20世纪以前的翻译理论发展史,其中涉及Cicero的“字译法”(word-for-word)、Jerome的“意译法”(sense-for-sense)等重要观点。此外,本章还重点介绍了几位西方近现代译论家就翻译所发表的洞见,比如Schleiermacher等人关于“异化”与“归化”问题的思考,Dolet提出的意译原则及其所强调益智与移情翻译思想,Dryden的翻译“三分法”和Tytler的翻译“三原则”等等。值得指出的是,本章还提到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翻译传统,虽然只是点到为止,也已经向读者透露了这样一种讯息:在东方译坛上,终究还是有人曾就翻译发表过重要的见解。

如上所述,继语文学派统领西方译坛近两千年以来,语言学派的异军突起对翻译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作者才不惜用了4章的篇幅对相关问题进行浓墨重彩的介绍与评述。

首先,等值与等效问题是第3章关注的焦点,其中主要介绍了Jakobson的差异性静态等值观以及Nida基于语言普遍性原则(universalism)的功能(动态)对等论,除此之外,作者还就Newmark的语义和交际翻译、Koller的对应与对等概念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降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要言不烦的点评。第4章介绍了翻译中的3种“转

换”(shift)模式,其中包括Vinay和Darbelnet的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模式、Catford的形式对应和篇章对等及翻译变化的层次与范畴模式、Zwart关于翻译转换的比较—描写模式等。翻译中的转换模式雏形于对等值概念的反思过程,由等值走向转换可谓翻译研究中的又一次飞跃,尽管该模式存在着过分繁杂等不尽人意之处。

一般认为,有关对等问题的讨论近年来业已出现边缘化趋势,但事实却并非尽然,比如第5章所探讨的翻译的功能途径即可视为一种宏观意义上的对等观:首先,Reiss(1989)将文本类型学引入对等问题研究,并系统地划分出了3种不同的文本类型,指出动态交际功能与目的只有在文本层面才有可能得以实现;基于Reiss的文本类型模式和Mänttari的翻译行为模式,Vermeer继而提出了翻译的功能目的论,在这里,从翻译方法的运用到翻译策略的选择无一不取决于特定的翻译目的;目的论的缺陷在于缺乏普遍的有效性,且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源语及译语文本的微观语言层面,针对这些问题,Nord(1997)引入了文本分析理论,用以分析句子及其以上结构或单位,并据此构建了一整套庞杂的文本分析系统。由是观之,对等概念的确对整个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在接下来一章中,有关翻译过程中话语及语域分析模式的研究即是从功能语言学视角就对等问题所作的又一次尝试:House的翻译质量评价模式主要基于语域理论中的“语场”(field)、“语旨”(tenor)及“语式”(mode)等3种参数系统;Baker进而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了话语或篇章层面,内容涉及语篇衔接、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及其与翻译之间的内在关系等,其中语用分析是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的另一条主线;Hatim和Mason则把语用学及符号学整合进语域分析过程,并进而探讨了社会权力关系在翻译交际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上述现象表明,在多元化的翻译研究格局中,语言学途径不仅没有遭到放逐,其路径反而愈发得到了拓展。究其原因,自然少不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当代语言学及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滋养,而与此同时,文化因素的渗透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催化作用,比如在Hatim和Mason那里,社会权利关系业已悄然出现于翻译研究的议事日程。事实上,继“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的文化途径本身就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也是如下3章所关注的主要内容。第7章首先引入了Even-Zohar的

多元系统论, 该理论以整个目标语文化和文学系统为背景, 对影响翻译文学地位的诸种因素进行了全方位考察; 此后, Toury在吸收、借鉴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3种规范模式, 分别用以指涉译语文化的翻译政策、译者的文化依附和翻译过程中的各种现实抉择; Chesterman则重新界定和划分了翻译规范, 并将译文读者、翻译伦理、社会语言等更为宽泛的语境整合进研究过程; 作为操控学派的代表人物, Hermans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也对翻译规范进行了深入探讨, 而到了Lambert和Corp那里, 两人在拓宽理论研究的同时又增加实证分析的分量。

近几年来,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的确表现出了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 这一点将在接下来两章中得到进一步的论证: 同Hermans等人一样, Lefevere也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将意识形态、诗学等概念引入探讨, 并进而提出文学翻译即“改写”(rewriting)的崭新理念; Simon则在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的平台上对翻译问题进行了另类的操作, 而女性主义翻译学派即发轫于此; 以Spivak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翻译学派更关心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权利等政治因素, 此外, 作为一种典型的后现代译学思潮, 其本身也表现出了多元化特征, 比如巴西的“食人主义”(cannibalism)即是该派的一个重要分支; Venuti也十分关注文化差异性、意识形态及主流话语对译者的影响与制约, 其目的在于构建一套阻抗的(resistant)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实践策略。事实上, 关于翻译中的异质性问题, 法国译论家Berman早于1992年就曾作过相关论述, 数年后, 他进一步提出了“文本变形”(deformation)系统的“负面分析”(negative analytic)等重要观点,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在以往的研究中, 人们并没有给予这位先河者应有的关注。

第10章介绍了翻译研究的哲学途径。我们知道, 众多西方哲人都曾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 比如Quine(1970)的意义不确定性就是在翻译的平台上展开的, 到了Derrida手中, 翻译更是成了引向哲学殿堂的“通道”(passage)。解构主义翻译观的要义可见于“无不可译, 无可以译”(Nothing is untranslatable; nothing is translatable)(Derrida, 2001)一语: 如语言“可以译”, 则“逻格斯”(logos)即由于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关系的断裂而丧失其纯粹的真理性的, 若语言“不可译”, 则“逻格斯”同样会由于无法跨越语际障碍而失去普

遍的真理性。从源头上看，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主要滥觞于Benjamin的《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一文：译者的任务不是复制原意，而是通过字对字直译将“纯语言”(pure language)从原文中释放出来，只有这样，原作才有可能获得“嗣后的生命”(after-life)。同Benjamin一样，Pound的兴趣也不在意义一面，而是由节奏、声音与形式释放出的语言“能量”(energy)。Steiner的翻译思想则属于解释学一派：翻译要历经“信任”(trust)、“侵入”(aggression)、“吸纳”(incorporation)和“补偿”(compensation)这一完整的“诠释运作过程”(hermeneutic motion)，故此原文的理解也会不可避免地渗入译者的个人经验，从而使翻译成为对于原文的再度创造。

上述现象表明，在翻译研究的多元化格局中，每一种流派或观点大都只能从单一的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有限的诠释，且相互之间往往会产生龃龉或对峙现象。鉴于此，Snell-Hornby尝试性地推出了译学研究的综合途径，旨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学科，这也是本书最后一章的主要内容。Snell-Hornby指出，要提高自身的学科地位，翻译学建构必须搭建起综合性跨学科研究平台：语言学、文化及文学理论以外，还应将心理学、哲学等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在综合视角下，Snell-Hornby打造了一种全新的译学研究架构与范式：1. 翻译学是一门跨语言、跨文化的综合性学科；2. 翻译研究的分析套路应表现为由上至下的拓展；3. 翻译研究应关注微观与宏观相互融合的整体关系网络。Snell-Hornby的观点得到了不少译界中人的积极回应，比如Harvey将语言学分析和批判理论进行融合，运用“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分析了文学文本中同性恋人群的话语(camp talk)模式及其翻译策略，指出翻译研究既不能过分强调霸权、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宽泛的文化问题，也不能忽略代表性语篇的语言学分析，换言之，要建立独立的综合性翻译学科，研究者必须在本质层面上对语篇和语境进行有效的关联。

三、再评

关于本书的亮点，前文已有所交代，这里有必要再列出几点：1. 纵览全书，可谓精彩处处，其思路也清晰，其布局也巧妙，再由内容上观之，作者不啻为我们勾勒了一幅西方译学思想的全景图；2. 理论阐

述具有相当强的内在联系性，各章节之间均不乏必要的承启与衔接，既体现了译学研究的系统性，又有利于读者对本学科发展脉络进行整体性把握；3. 理论与实践互动性强，众多设计完美的个案分析能够卓有成效地提高读者的理论阐释能力；4. 每介绍一种理论或流派，作者总会对相关评价与批评进行旁征博引，且不保留个人的独特见解，从而能够引导读者形成自己的理论鉴别与评判能力；5. 每章结束部分均附有一套颇具有启发性的论题集，其中不少内容与所学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息息相关，所有这些对于激发读者的独立思考及参与意识都将产生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

当然书中也存在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1. 就流派介绍的体系性与完整性来看，作为西方译界的主要学派之一，Gutt的关联翻译（relevance translation）理论本应该重重写上一笔，而作者却在介绍Derrida的“关联翻译”（“确当的翻译”）（relevant translation）时将其一笔带过；2. 基于心理语言学途径的有声思维纪录法（TAP；think-aloud protocol）对翻译中的策略选择、转换单位、情感因素等方面的差异性进行了不少有益的实证性探索，对于这一热门话题，本书却只字未提；3. 对于个别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与思想，作者同样忽略了某些不可缺少的内容，比如巴黎释意派代表人物Delisle后期的重要观点并非仅仅是针对口译而言的，因此应另辟章（节）予以介绍。当然，就上述问题来看，我们似不应该对作者过分苛求，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终究不过是一本薄薄的教科书，面面俱到自然是难以企及的。但尽管如此，某些内容的缺失毕竟是一种难以弥补的缺憾。

在流派或学派划分方面，显然也不乏商榷的余地：1. 据作者所言，8、9两章介绍的是翻译研究的文化途径，这样一来，第7章内容也就不易归类了，其原因是，多元系统论和规范论均问世于20世纪70年代，而描写译学范式则要再后推20年才开始臻于成熟，撇开时间跨度问题，仅就其取向而论，该章内容基本上应归入文化学派之列；2. Venuti的翻译观融合了Schleiermacher的异化翻译概念、Said等人的后殖民理论、Derrida的解构主义思想等，这种杂合现象无疑也导致了分类上的难题：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将其分别归属于解构学派、文化学派以及后殖民学派的均不乏其人，而本书作者则将其作为文化学派的一个分支另

章进行了介绍，该取道显然只能代表一家之言；3. 在第10章，作者根据Steiner的观点将Pound并入了翻译研究中的哲学流派，如此取向似乎也难以服众：Steiner只是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考察了Pound和Benjamin的翻译理念与思想，后者姑且不论，Pound究竟应归属于何种流派，这一点似乎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然而无论如何，作为一部面向译学后进的蒙学读本，该书在同类著述中的确不乏独特的价值，所以好评如潮，也是自然的事。至于权威性方面，这里不妨援引Hatim不失公允的评价以为佐证：作者成功地、为翻译研究这门发展迅猛的学科拍下了一张快照，其内容精辟，形象鲜明，从而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了该研究领域中诸多的当下性问题。

刘全福

2010年2月

参考文献

- [1] 王东风.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互动的[J]. 上海科技翻译, 2003 (1): 7-8.
- [2] Derrida, J.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J]. trans. L. Venuti. Critical Inquiry, 2001, (27): 175-200.
- [3] Snell-Hornby, M. Linguistic transcoding or cultural transfer: A 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Germany[A]. in S. Bassnett and A.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C].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1990: 79-86.
- [4] 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 [5] Quine, W. V. On the reasons for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J]. The Journey of Philosophy, 1996, (6): 178-183.
- [6] Reiss, K. 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A]. trans. by A. Chesterman, in A. Chesterman (ed.).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C]. Finland: Oy Finn Lectrua Ab. 1989: 105-115.

Acknowledgements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following copyright holders for giving permission to reproduce the following: Figure 1.1, reproduced from G.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 And Beyond*, copyright 1995,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Figure 3.1, reproduced from E. Nida and C.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69, Leiden: E. J. Brill. Figure 5.1, reproduced from A. Chesterman (ed.),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 copyright 1989, Helsinki: Finn Lectura; based on a hand-out prepared by Roland Freihoff; permission kindly granted by the author. Table 5.1, adapted from K. Reiss,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Übersetzungskritik*, copyright 1971, Munich: M. Hueber. Figure 6.2, reproduced from J. House,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 Model Revisited*, copyright 1997, Tübingen: Gunter Narr. Figure 11.1, reproduced from M. Snell-Hornby,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copyright 1995,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The case study in chapter 8 is a revised and abridged version of an article of mine: 'The Caribbean conquers the world? An analysis of the reception of García Márquez in translation', published in *Bulletin of Hispanic Studies*, 75.1: 137–44.

I am sincerely indebted to Professor Lawrence Venuti for his encouragement with this project and for his detailed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earlier drafts of the book. He has assisted considerably in sharpen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focus and in pointing out errors and inaccuracie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inal version is, of course, mine alone.

My thanks also go to Dr Rana Nayar (Reader, Department of English at Panjab University, Chandigarh, India) for his assistance with the case study in chapter 9, to my colleagues at the Universities of Bradford and Surrey for their support during the writing of this book, and to my students at Bradford, on whom some of the materials in this book have been 'tested'.

I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Louisa Semlyen and Katharine Jacobson at Routledge, who have been very supportive and professional both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project and throughout the writing and editing process.

Finally, warm thanks to my family and friends who have had to put up with me writing away on the computer instead of relaxing with them,

especially to my brother Chris in France and everyone in Madrid and Mallorca. Most of all, thanks to Cristina, whose love and help were so important during the writing of this book.

*Jeremy Munday
London, September 2000*